

## “一带一路”视域下的印尼道教

◎ 郭 武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考察印尼与中国的交流历史，并结合近期的田野调查材料，介绍了道教在印尼社会的大致情况。作者认为，印尼华人的道教目前虽然多在“三教”名下活动，且常与民间信仰混融而不能被视为“纯粹”，但由当地不少华人声称自己信奉道教，以及其许多庙宇供奉玄天上帝、关圣帝君、玄坛元帅、张天师等道教神灵，可知他们的身份应该属于道教信徒。

**关键词：**印尼道教 一带一路

**作者简介：**郭武，云南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位于亚洲大陆与澳洲之间，由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约 17508 个岛屿组成，自古即是海上贸易的重要通道，在中国与印度、西亚、地中海、北欧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据学者研究，印度尼西亚有上千个种群和亚种群、数千种语言和方言，是世界上文化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直到近代，这些经历了各种王国更迭以及荷兰、日本殖民统治之后的居民最终被包含在同一个政治框架内，于 1945 年独立成为一个新的国家。<sup>①</sup> 作为占据“海上丝绸之路”咽喉要道的印尼，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有重要地位，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根柢”之道教，在印尼华人社会中的状况和作用究竟怎样？也是一个值得学界讨论的问题。以下，拟通过考察印尼与中国的交流历史，并结合近期参加“道教节世界庆典 2018”的调查材料，谈谈对于印尼道教及其影响的认识。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流，早在殷商时期甚或之前就已开始，如《逸周书》曾记伊尹建议商汤接受“正南”诸国的珠玕、玳瑁等献品。<sup>②</sup> 这种交流，在《汉书·地理志》中关于都元国、邑卢没国、谶离国、夫刚都卢国、黄支国、已程不国及其奇珍异宝的记载中得到了彰显。<sup>③</sup>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播以及中国南北的对峙，不少僧人、商人更是经由东南亚地区进入中国，并有一些中国人逐渐移居东南亚。<sup>④</sup> 印尼与中国的文化交流，较早见诸文字记载的则是在公元七世纪，如唐代僧人义净曾往印度学法，归国途中在南海室利佛逝国停留七年，并于此著成《南海寄归内法传》；<sup>⑤</sup> 《宋高僧传》又载唐高宗麟德年间（664—665 年）有成都沙门会宁“泛舶西游，路经波凌”，并与该国僧人智贤（释若那跋陀罗）“同译涅槃后分二卷”<sup>⑥</sup>。据有关学者考证，室利佛逝国位于南苏门答腊岛，崛起于公元七世纪，波凌（亦作“诃凌”）则是七至九世纪间统治爪哇岛的王国，亦是后来日惹地区著名的“婆罗浮屠”

① 史蒂文·德拉克雷 (Steven Drakeley)：《印度尼西亚史》，郭子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年版，第 1—2 页。

② 《逸周书·伊尹朝献》，《四库全书》本。

③ 《汉书·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 1671 页。

④ 详请参阅程爱勤：《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宗教关系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38—176 页，第 192—215 页。而据西方学者研究，早在公元前 2500 年，太平洋中南部诸岛的人们即开始经由台湾、菲律宾诸岛进入印度尼西亚，至公元前 500 年，北爪哇岛港口已开始与中国南部、东南亚大陆以及印度进行贸易，详请参阅史蒂文·德拉克雷：《印度尼西亚史》，第 7 页，第 10—13 页。

⑤ 《开元释教录》卷九，《四库全书》本。

⑥ 《宋高僧传》卷二《唐波凌国智贤传（会宁）》，《四库全书》本。

塔群之修建者，两国皆曾向中国的唐王朝派遣过使节。<sup>①</sup>至于华人大规模地移居印尼，一般认为是在十七世纪初荷属“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后，当时的荷兰殖民者为了开发、掠夺印尼资源，曾采用非法手段到中国闽粤沿海地区诱骗劳工，以致有数百万的“契约华工”（俗称“猪仔”）飘洋过海来到印尼；186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开放海禁，涌向印尼居住、谋生的华人更不断地增多，以致今天印尼华人华侨的人数已逾1000万。<sup>②</sup>

随着华人的大量移居，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也一起进入了印尼。据相关资料记载，印尼较早的华人庙宇有三宝垄（Semarang）始建于1400—1416年间的供奉郑和的三保洞（Sam Poo Kong）、雅加达（Jakarta）始建于1650年的佛教寺院金德院（Kim Tek Ie）、万鸦老（Manado）始建于1819年的道教宫观万兴宫（Ban Hin Kiong）、廖内省（Riau）始建于1868年的道教宫观护安宫（Hoo Ann Kiong）等。<sup>③</sup>进入印尼的中国传统宗教，包括儒、释、道三教及各种民间信仰，不过或许是因当代印尼官方只承认“孔教”（儒教）与伊斯兰教、印度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等属于合法宗教，所以目前可见著述多只对“孔教”及其组织机构如“孔教总会”、“印尼孔教最高理事会”等进行了介绍，而对道教及各种民间信仰甚少叙述。<sup>④</sup>但事实上，“孔教”一词仅能代表儒家文化，并不能涵盖道教以及其他民间信仰，而中国的道教以及一些民间信仰又确实存在于印尼社会，所以后来印尼华人又在“孔教总会”等机构之外成立了“三教会”或“全印尼三教庙宇联合会”、“印尼三教庙宇协会”等，借以容纳道教与其他民间信仰，并藉之召集相关信众、组织各种活动、弘扬华人文化。<sup>⑤</sup>也就是说，印尼华人的道教及民间信仰实际上多是在“三教”名义之下进行活动的。印尼华人宗教成立了不少组织机构，颇有“山头林立”之势，如前述“全印尼三教庙宇联合会”与“印尼三教庙宇协会”并无隶属关系；此外，笔者所见中爪哇省的道教多是隶属于“三教”名下活动，但在印尼其它地方却又有名为“印尼道教总会”（Majelis Tao Indonesia）、“印尼道教协会”（Paguyuban Umat Tao Indonesia）等组织存在<sup>⑥</sup>。这种信仰多样、组织繁杂而又互不隶属的状况，乃是当今印尼华人宗教的一大特点。此外，除了信奉传统的中国宗教，印尼华人还有一部分皈依了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sup>⑦</sup>，这也是印尼华人信仰的一种特色。

印尼华人的道教虽多在“三教”名下活动，且常与民间信仰混融而不能被视为“纯粹”，但由当地不少华人声称自己信奉道教，及其不少庙宇主奉玄天上帝、关圣帝君、玄坛元帅、

① 史蒂文·德拉克雷：《印度尼西亚史》，郭子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8—9页，第12—13页。

② 罗英祥：《印度尼西亚客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页。按：上述数字属于官方公布结果，而该书《前言》则称民间估算印尼华人华侨的人数实际上已逾2000万。

③ 详请参阅“维基百科”（Wikipedia）网站之词条“印尼的道教庙宇（Taoist temples in Indonesia）”（[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tegory:Taoist\\_temples\\_in\\_Indonesia](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tegory:Taoist_temples_in_Indonesia)）。

④ 有关“孔教”及其说教内容、组织形式等，详请参阅梁敏和：《印度尼西亚文化概论》，广州：世界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90—99页。

⑤ 有关“三教”及其庙宇状况、组织机构等，详请参阅王爱平：《宗教对印尼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作用——以印尼孔教、“三教”为例》，北京：《世界民族》，2010年第5期。有关印尼华人的民间信仰情况，详请参阅王爱平、鲁锦寰：《台湾民间宗教信仰在印度尼西亚传播之考察散记》，见郑筱筠主编：《东南亚宗教研究报告：全球化时代的东南亚宗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8—200页。

⑥ 据“百度文库”收录东华门生搜集整理的《世界各地道教组织及网站一览（2011版）》载，2009年在法国成立的“国际道教协会”中即包含以黄信心为主席的“印尼道教总会”以及以李彬盛为顾问、丘杰源为会长的“印尼道教协会”。又据相关网站报道，黄信心、李彬盛等人曾分别率领“印尼道教总会”及“印尼道教协会”的成员多次赴中国大陆、台湾的道教官观参访，涉及江西龙虎山、海南玉蟾宫、吉林玄帝观、南明玄妙观以及台湾张道桢“袭职”诸事，兹不细述。

⑦ 详请参阅梁敏和：《印度尼西亚文化概论》，第77—85页。

张天师、二郎神、哪咤三太子等道教神灵（详下），可知他们的身份应该属于道教信徒。有关道教在印度尼西亚的发展情况，印尼人士张理彼曾撰文进行过介绍，主要讲述了道教在印尼面临的困难，如尚未被政府正式承认为合法宗教而只能“寄身”于当地“三教会”，所以在传播方面有着诸多不便。同时，该文还提及目前印尼道教信众的宗教素质不高、对道教学说知之甚少，并呼吁各界给予他们更多的耐心、关怀和扶持。<sup>①</sup> 2018年3月，笔者有幸接受“道教节世界庆典2018”组委会邀请，赴印尼马吉朗市参加相关活动并担任“国际道教论坛”的主持人，有机会对道教在印尼的发展和影响进行考察，对于印尼的道教有了更多的认识和理解，现将所见所闻梳理叙述如下，以供学界参考。

“道教节世界庆典”渊源于1996年新加坡道教协会发起的“道教节庆典”（Taoist Day Celebration）活动，之后马来西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相继效仿，印尼三宝垄则于2009年开始与新加坡联合举行庆祝活动。至2011年，由于欧洲意大利道教协会的加入，该活动始扩大范围而改称“道教节世界庆典”（Taoist Day Worldwide Celebration）。其内容主要为在道教圣祖老子（太上老君）诞辰日（中国农历二月十五日）这天，邀请全球道教徒齐聚道教圣地、联合举办庆典，以图增强道徒身份的认同、传播道教的学说、扩大道教的影响。据该活动首倡者之一、新加坡道教协会李至旺会长介绍，举办这项活动的一个近期目的，是在扩大道教影响的基础上向东南亚某些国家的政府机构申请将太上老君诞辰日确定为该国的“法定假日”，以图享有其他宗教在东南亚各国的权利（因为东南亚各国多在重要的宗教节日期间放公休假），藉此提升华人及其宗教的社会地位。作为首倡联合庆典的国家之一，印尼已多次承办了这个节日的庆典活动，且马吉朗市已是第二次承办“道教节世界庆典”。由印尼道教界积极倡导并参与该项活动，可窥其希望提升华人宗教地位之急迫心态。

承办2018年“道教节世界庆典”的马吉朗福隆庙，是中爪哇省著名的华人庙宇，主供“福德正神”并祀天上圣母（Thian Siang Sing Bo，即天后妈祖）和观音菩萨（Kwan She Im Po Sat）。该庙为今年“道教节世界庆典”安排的活动，主要有“朝圣大典献供典礼”、“国际道教论坛”、“福德正神巡游”几大板块。其中“朝圣大典献供典礼”按照道教传统的科仪，向“三清道祖”神像进行祈祝、献供，显得颇为隆重而神圣；“国际道教论坛”则邀请著名学者和道长，对有关道教的问题发表见解，并就“21世纪道教在海外持续性发展”主题展开讨论；“福德正神巡游”乃是这次庆典活动的高潮，不仅福隆庙主神“福德正神”出庙巡游，而且印尼各地华人庙宇的众多神灵也一起陪同，场面壮观且热闹非凡。据隆福庙基金会主席庄宝贵先生介绍，印尼的道教徒并不擅长做科仪法事，这次“朝圣大典献供典礼”所行道教科仪是新加坡玉皇宫李至旺道长帮助安排的，而李至旺则说他主要从中国内地请了一些道长前来帮忙，并说这种正统道教的仪式“引导”对于印尼来说很重要。或认为印尼福隆庙成员不会做道教的科仪法事，似乎表明他们并不归属于道教，但笔者却以为：由其自愿主办“道教节世界庆典”并完全按照道教的仪轨来举行“朝圣大典献供典礼”，我们不可否认福隆庙以及参加这次活动的各地庙宇对于道教之“信仰”。事实上，在时间的涤荡及环境的磨难下，道教界常有“丢失传统”的现象发生，如清代龙门派道士的戒律文书曾经失传<sup>②</sup>，而近年中国一些

① 详请参阅张理彼：《道教在印尼的传播》，宣读发表于“道教节世界庆典2014·国际道教论坛”（印尼马吉朗，2014年3月）。

② 如《尹真人东华正脉皇极闾辟证道仙经》记载清代全真龙门派戒律传授情况曰：“所传之书，义理本无所禁。然戒律郑重，恐人褻玩故轻泄之。律最严，是以律裔一概袭藏，而凡无人可授之裔，则必聚而焚之。此食古不化之流弊。律祖三传而道遂绝。今嘉庆间所开演钵，邱祖成本失传，近所传访诸《净明宗教录》，与邱祖（处机）所传小同而大异也。我山先辈，亦守戒焚之，书则录本幸存，而卷、律亡矣。先师太虚翁道及，必抚膺流涕，盖为此耳。”见闵一得编《古书隐楼藏书》，《藏外道书》本。

地方的宫观也不谙道教科仪<sup>①</sup>。我们不能因为部分的缺失，而否认总体的存在<sup>②</sup>。

印尼华人对这次“道教节世界庆典”的响应非常热烈，共有60余家印尼各地的华人庙宇参加了神像“巡游”活动。据印尼三教庙宇协会主席、福隆庙基金会辅导主席林万金先生介绍，本来还有更多的印尼华人庙宇要求参加这次庆典，但因“巡游”需要大批人员护送该庙神像前来，并从事抬轿、鼓乐、舞龙、耍狮等工作，而马吉朗市及附近的酒店、旅馆难以提供足够的住宿房间，所以只好婉拒其他庙宇的申请，只能同意最先申请的60家庙宇前来。但即使这样，还是有一些庙宇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前来参加“巡游”。“印尼三教庙宇协会”在马吉朗市组织“巡游”的工作人员曾提供给我一份参加活动的庙宇名单，上面有60家庙宇的名称、地址、电话、供奉主神、负责人员和前来参加这次活动的人数，以及所携香炉、神幡、神轿的数量，并逐一在“巡游”队伍中向我指认他们。从这份名单来看，前来参加活动的60家庙宇分别来自雅加达特区、西爪哇省、中爪哇省、东爪哇省、东南苏拉威西省、万丹省以及小巽他群岛等省区的30余个县市，所奉有福德正神、玄天上帝、玄坛元帅、修德真君、张天师、法主公、二郎神、哪咤三太子等各式各样的神灵，覆盖面可谓广泛。

印尼华人的庙宇不仅分布地区颇为广泛，而且所奉神灵也有其特色。一般说来，印尼华人庙宇多供奉“福德正神”<sup>③</sup>，如“印尼三教庙宇协会”给我的那份“巡游”名单即列有20余座庙宇主奉“福德正神”(Hok Tek Tjing Sin)，其中包括井里汶(Cirebon)的“福公堂”(Hok Keng Tong)、古布格(Gubug)的“福安庙”(Hok An Bio)、博罗内戈罗(Bojonegoro)的“福绥庙”(Hok Swie Bio)、加布棉(Kebumen)的“福德庙”(Hok Tek Bio)、蒙蒂兰(Muntilan)的“福安宫”(Hok An Kiong)、帕拉坎(Parakan)的“福德堂”(Hok Tek Tong)、克拉登(Klaten)的“寿山堂”(Padma Karuna Vihara)、古杜(Gudo)的“弘善宫”(Hong San Kiong)、肯多(Kendal)的“玄天上帝庙”(Hian Thian Siang Tee)、佩卡隆安(Pekalongan)的“宝安天”(Po An Thian)、八玛兰(Pemalang)的“绥弘坛”(Swie Hong Tang)、淡满光(Temanggung)的“光灵庙”(Kong Ling Bio)、乌鲁查米(Ulujami)的“正义庙”(Tjeng Gie Bio)、温加兰(Ungaran)的“蝙蝠山”(Sri Kukus Redjo)、沙拉迪加(Salatiga)的“善心宫”(San Xin Kong)与“福德庙”(Hok Tek Bio)、三宝垄(Semarang)的“关圣庙”(Gwan Sing Bio)与“福圣庙”(Hok Sing Bio)等。这份名单中还有一些庙宇，如三宝垄的“阿甘阿斯”(Ageng Asih)、“莲花生”(Lian Hua She)、“慧蒂社”(Hwie Tik Sie)、“兰海堂”(Lam Hay Tong)、“白莲堂”(Bai Lian Tang)等，名称显有印度文化的色彩，但却同样主奉印尼华人的“福德正神”。

除了“福德正神”外，印尼华人还多崇拜关羽。关羽本是三国时期的著名武将，后作为“义”与“勇”之代表而在中国民众心目中享有很高地位，甚至成为了道教的“三界伏魔大帝”，并被中国佛教尊为守护寺院的“伽蓝神”，明清以来又常被民间奉为庇护商贾的“财神”。

① 例如2016年7月间笔者曾陪同美国汉学家柏夷(Stephen Bokenkamp)教授实地考察云南大理某著名宫观的“南斗会”，得知该观道士并不参与相关的科仪法事，而是延请其它地区的正一道士前来举行宗教仪式。

② 据“维基百科”言：源自中国的印尼道教在教义、神学方面多与中国道教相同，其供奉神灵的场所也称“宫”，主要崇拜玄天上帝、天上圣母、太上老君、九天玄女、二郎神等；其法脉既有属于“正一道”的茅山派、闾山派和六壬派，也有属于重阳创立的“全真道”；此外，近年印尼还出现了尊奉太上老君之“太上门逍遥派”，其活动方式有“神功”、“气功”和“静坐”等。详见印度尼西亚文版“维基百科”之“道教”词条“道教在印尼的发展”部分(<https://id.wikipedia.org/wiki/Taoisme>)。

③ “福德正神”又称“福德爷”或“大伯公”等，实即中国民间所奉“土地公”，在东南亚地区有着很大影响。详情请参阅吴诗兴：《马来西亚的福德正神信仰探析——以砂拉越的大伯公庙为主要探讨》，台南：《成大宗教与文化学报》，第十三期(2009年12月)。

当明清大量华人移居东南亚时，他们对关公的崇拜也被一起带入了这一地区，并对当地华人的日常生活、相互凝聚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今日在越南、柬埔寨、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仍可见到不少“关帝庙”。<sup>①</sup> 在由“印尼三教庙宇协会”工作人员提供的那份名单中，也列有不少主拜“关圣帝君”（Kwan Sing Tee Koen）的庙宇，这些庙宇多以“关公”、“关圣”或“关帝”为名，如三宝壟的“关圣庙”（Gwan Sing Bio）、巴厘（Bali）的“关公庙”（Kwan Kong Bio）、丹格朗（Tangerang）的“关帝庙”（Kwan Tee Bio）皆是如此。但也有一些其他名称的庙宇将“关圣帝君”作为主神供奉，如南望（Rembang）的“福德庙”（Hok Tik Bio）、三宝壟的“灵福庙”（Ling Hok Bio）、斯来威（Slawi）的“福怡宫”（Hok Ie Kiong）等，甚至一些佛教寺庙如诗都阿佐（Sidoarjo）的“巴克提佛寺”（Vihara Dharma Bhakti）也将“关圣帝君”作为主神供奉。有趣的是，还有一些虽然名为“关帝”或“关圣”的庙宇或道坛，供奉的却是“福德正神”或“玄天上帝”等其他神灵，如三宝壟的“关圣庙”（Gwan Sing Bio）供奉的是“福德正神”（Hok Tek Tjing Sin），而“关帝坛”（Kwan Tee Tong）供奉的则是“玄天上帝”（Hian Thian Siang Tee），这一方面显示关公信仰在印尼华人中颇为流行，另一方面也表明宗教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着变异。

马吉朗福隆庙承办的这次“道教节世界庆典”活动，得到了印尼官方的认可和支持，印尼国家宗教部和马吉朗市政府不仅委派官员出席了开幕仪式，而且还在市内划出专门路线供奉神像“巡游”，并动用大量警力帮助维护秩序。而在各地庙宇神像“出巡”的3月25日，马吉朗的市民更是倾巢而出，或携儿带女在沿途等候围观，或准备饮料供巡游队伍取用，或直接加入游行队伍而追随他们扛抬神轿、敲锣打鼓、尽情欢娱。这次马吉朗“巡游”的盛况，颇似中国民间的“庙会”以及台湾的“迎神赛会”，并有史籍所谓“车马喧阗，士女栉比，连臂踏歌”<sup>②</sup>之景象，表现出了宗教民俗对于普通百姓的吸引力。尤其值得一说的是，这次“道教节世界庆典”还吸引了不少当地土著前来参加。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巡游”当天除了预定安排的一些华人庙宇参加活动之外，还有马吉朗当地和附近的一些印尼土著人士，兴致勃勃地妆扮各异、携带本土的神灵前来加入“巡游”队伍。这种状况，反映的不仅是华人宗教在当地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而且是目前印尼社会各种民族、宗教和谐相处的局面。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道教在印尼的发展尚面临着一些困难。印尼华人的数量虽逾千万，但在总人口超过2亿的该国居民中却仅占约5%，可谓属于比较弱势的“少数民族”。在1965—1998年苏哈托实行排斥华人的“四不准”政策期间，广大印尼华人非但不能开办华文学校、成立华人社团，而且不准使用汉语汉字，甚至不得沿用赖以记忆先人、认祖归宗的中文姓氏而被迫改成印尼名字，其地位低下、处境悲惨可想而知。在这次调查过程中，很多朋友虽然向我表达了对印尼华人挣脱“四不准”枷锁的高兴，也对目前华人宗教的发展势头表示欣慰，但他们仍有一些担心和忧虑，如“印尼三教庙宇协会”主席林万金先生向我表示：他们积极承办“道教节世界庆典”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在扩大道教影响的基础上，向印尼政府申请承认道教在该国的合法性，进而申请“道教节”成为法定的节假日；但是，从2014年马吉朗福隆庙首次承办“道教节世界庆典”活动以来的情况看，相关申请阻力颇大，前景似乎不容乐观。据相关统计，目前印尼是全球伊斯兰教信徒最多的国家，穆斯林占全国总人口的88%以上，其他各种宗教的信徒占印尼人口的比例仅约10%，华人宗教力量在印尼

① 有关“关公信仰”在东南亚国家的存在情况，详情请参阅佚名撰《东南亚关帝庙和关公信仰》一文，载《福州晚报》（电子版）2001年7月15日。有关东南亚华人崇祀关公之各种渊源、形态及功能，详情请参阅王琛发撰《殊途同理：马来西亚关帝崇祀的诸种渊源与形态》，见“中国网·道家文化”（[http://dao.china.com.cn/2017-12/11/content\\_40100835.htm](http://dao.china.com.cn/2017-12/11/content_40100835.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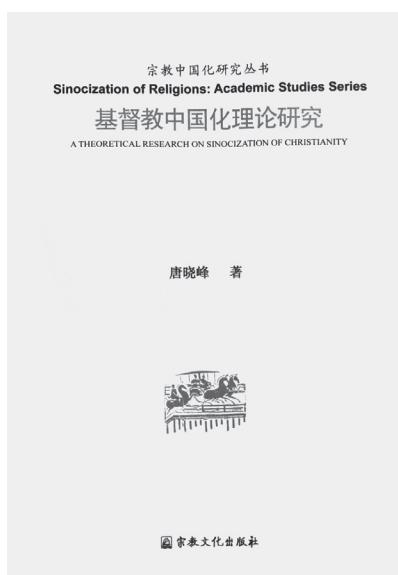
②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卷五《吴彩鸾》，《道藏》本。

社会中颇显薄弱。<sup>①</sup>虽然印尼政府在1998年后就已废除排斥华人的“四不准”政策，但印尼民间却仍有歧视、打压华人宗教的现象存在，如林万金先生谈到2014年马吉朗首次承办“道教节世界庆典”时，曾有不少当地穆斯林群众聚集在福隆庙外表示反对。而在2017年3月，东爪哇省图班市还因当地关圣庙新塑了一座巨型关公像，而引起了一些穆斯林团体的激烈抗议，以致庙宇管理者不得不用白布暂时把关公像遮蔽。<sup>②</sup>虽然后来印尼总统府出面表示擅自破坏塑像者将受法律制裁，显示出官方对待各种民族、宗教的平等与包容，但道教在印尼的尴尬处境却由此可窥一斑。作为一名研究道教的中国学者，笔者非常理解海外华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热爱，同时也希望学界进一步关注对东南亚华人宗教的研究，充分发掘作为中华文化“根柢”的道教对于凝聚海外华人之“纽带”作用。

(责任编辑 王皓月)

## 《基督教中国化理论研究》简介

作者：唐晓峰，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年版



基督教作为一种具有异质文化色彩，且在当前中国拥有3800万庞大信众群体的信仰体系，其中国化的进程较早便受到学界关注。2013年以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主编的“基督教中国化研究丛书”“宗教中国化研究丛书”及《基督教中国化研究》年刊陆续出版问世。“基督教中国化”概念一经提出，亦得到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尤其是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对于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这一宗教工作目标进行明确后，“基督教中国化”俨然成为基督教研究领域最热门话题。唐晓峰副研究员撰写的《基督教中国化理论研究》一书为“宗教中国化研究丛书”之一，其中收录了作者多年来围绕“基督教中国化”问题所进行的理论思考及相关著述，并按照概念界定及必要性、历史视阈、文化处境、代表人物及思想等多个主题加以整理阐发，既有宏观的理论及历史视阈，又具微观问题及人物研究维度，是国内学术界首部对“基督教中国

化”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之作。该书认为“基督教中国化是基督教与中华民族、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中国社会和谐共处的关键环节，它不但必要，而且从当前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来说，这项任务还十分紧迫，它是一种政治认同层面的考量，同时还是基督教的普世性与处境化间辩证关系、基督教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它需要基督徒及其团体、宗教工作者、宗教学者以及社会中的每个个体的共同参与”。

① 详情请参阅梁敏和：《印度尼西亚文化概论》，第65—100页。

② 详见“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7-08/11099131.html>）。